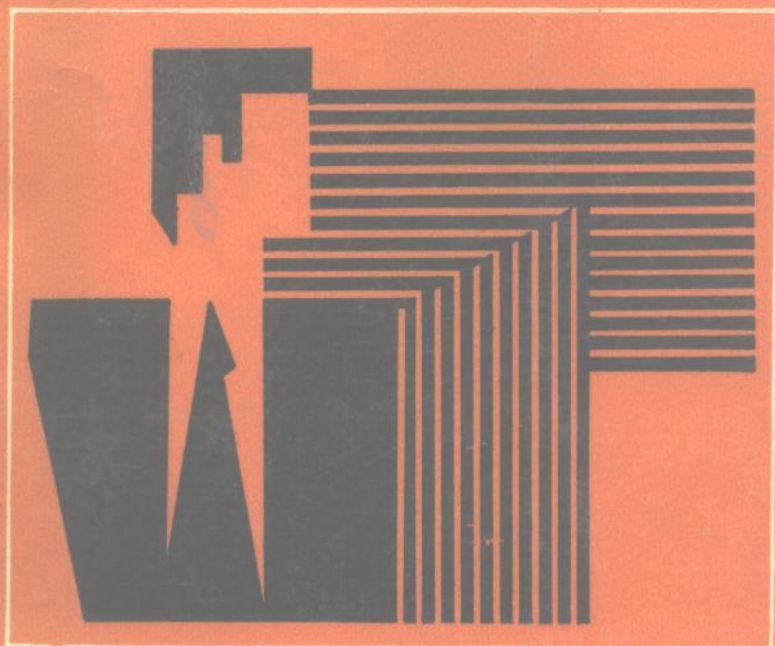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文库

历史学家和 社会学

〔苏〕米罗诺夫 著
王清和 译



华夏出版社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

WENKU.

〔苏〕米罗诺夫 著

王清和 译

华夏出版社

1988年·北京

责任编辑：于沛

封面总体设计：郭力 钮初 呼波

李明 王大有

本书封面设计：徐天离

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тронов

ИСТОРИК И СОЦИОЛОГ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 1984Г.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

〔苏〕波·尼·米罗诺夫 著

王清和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芽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5.75印张 132千字 插图2
198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7-80053-276-3/K·029

定价：2.30 元

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

主 编： 邓朴方

常务编委：

李盛平	张宏儒	肖金泉	贾 湛	王 伟
沈志华	黎 鸣	吴儁深	张显扬	陶德荣
褚朔维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在新	王 焱	邓正来	孙立平	孙连城
刘再复	李泽厚	朱青生	朱庭光	邵大箴
何家栋	吴衡康	林 方	范 进	张 琢
周 星	顾 昕	倪文杰	俞敏生	郭建模
唐 枢	高 崧	程方平	缪晓非	

社会学分编委会：

黎 鸣	张 琢	孙立平	王文仲	叶念先
孙 非	高 佳	梁向阳	何凡兴	李路路

序 言

苏联学术界并未将历史学与社会学对立看待，因为二者有一致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学家中存在着一种观念，认为历史学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历史学家则认为社会学家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克留切夫斯基（В.О.Ключевский）用两句话表达出历史学和社会学对待社会生活现象的不同态度：“在历史学中，我们只是求知较多的事实，却较少去理解现象的含义”；“从最高观点看，我们则蔑视事物，只看几何轮廓，不注意事物本身”。^①这种将历史学与社会学对立的观点是否正确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包括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一般社会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专门社会学理论或“中间层次”理论的总和，最后是运用专门方法论、方法、技术和概念进行的具体社会学研究。后两部分统称为“具体社会学”或“应用社会学”。

一般社会学理论在研究的各个阶段都为历史学家确定了方向：帮助选定研究课题和对象，在收集资料并使之系统化时凸现其有序因素，提供方法论基础以阐释历史学家揭示的事实，予以概括，发现其间的联系和因果关系。就此而言，将历史学与社会学对立看待是毫无根据的。

① В.О.克留切夫斯基：《书信，日记，关于历史的言论与思想》，莫斯科1968年，第329、327页。

历史学家一般对应用社会学所知不多,因而鲜少运用其概念、专门方法论、方法与技术。在此意义上,将历史学与社会学对立看待不无现实性。

历史学与应用社会学之间缺少紧密的创造性联系,根源在于社会科学传统上形成的劳动分工:历史学主要认识社会现象发展中的个性及其作用,社会学则主要认识现象发展中的共性及其作用。^①实际上,历史学家首先感兴趣的是,弄清现实中存在何物及其如何,直至微末的细节。为了重构过去的场景,查明所研究现象的规律性,进行历史比较分析,历史的可靠性、具体性和准确性被视为必要条件。与此相反,社会学家时常为了场景的共性而牺牲具体细节,为了逻辑的确切性和明晰性而牺牲历史的准确性,偏重于揭示现象的逻辑演变与普遍规律,而忽视通过全部具体表现去查明现象的历史演变与所有特性。把实质上是同一个研究对象即人类社会划分成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不同范围,这种传统做法已不再使学者们感到满意,这既出于理论上的考虑,也出于实践上的考虑。

众所周知,每一现象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致力于同时认识共性与个性是最佳研究途径。这是一种综合的、实质上是辩证的方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运用的范例,这种方法的优势正是近年来苏联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彼此发生兴趣的缘由之一。^②并且,历史学家的经验证明,历史学的规律性具有自己的特征,不能归并于社会学的规律性。^③虽然认识前者是

① 《社会学家工作手册》,莫斯科1977年,第8~19页。

② Н·С·科恩:《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历史学》,载《哲学与史学方法论》,莫斯科1977年,第12~13页。

③ А·Я·吉列维奇:《论历史规律性》,载《历史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莫斯科1969年,第51~79页。

历史学家的专长,但只有努力注意普遍的、在历史现象中按规律重现的事物,即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才可能达到这一认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概括,不掌握社会学的一些观念和概念,历史学不可能由关于事件的科学完全转变为关于社会经济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近几十年来,对这种转变的兴趣强有力地表现出来。

社会学家同样开始表示,不熟悉和注意社会现象的历史性质,便不能顺利工作。例如,难以弄清社会变迁的规律性,难以正确认识社会集团“活动”和社会流动的机制、城市化的后果、宗教意识的特点、民族关系的起源、对抗行为的原因等。预测在当代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样,只有在考虑到长时期趋向的基础上,即在历史背景下,才能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①

由于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在研究中彼此隔绝,致使许多著作虽然在其具体范围内价值巨大,但却很少或者只是偶而引起相邻学科人士的兴趣。最终结果是有关社会的科学在整体上遭受损失。历史学和社会学在自身发展中已获得重大成就、方法和概念的接近,相互交流经验与信息,无疑会使它们彼此受益。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协作必要性问题的提出,为此而采取的最初的实际步骤,便是证明,即出现了社会历史学著作。史学研究的课题范围扩大了,其中包括以往主要由社会学家从事的课题;用社会学方法(包括内容分析与结构方法)充实历史学,用历史学方法(包括史料考证与文献使用方法)充实社会学;召集跨学科会议;产生了独立的“边缘”学科——心理历史学和社会历史学。

由于最近一段时期来彼此发生兴趣,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之

① H·C·科恩:《历史学与社会学》,载《哲学问题》,1970年,第8期,第79~90页;
M·A·巴尔格:《社会史问题:当代西方中世纪学中的阐述》,莫斯科1973年,第22~28页。

间的接触正在加强。但暂时还未必能说他们的关系已出现重大转变。

历史学与社会学合作的前提是必须意识到，它们都需要什么帮助，一种科学能够向另一种科学提供什么帮助。历史学需要什么，社会学可以给予它什么？历史学家在研究中运用社会学观点面临着怎样的困难？

在分析大量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现象、其深层结构与功能机制时，正是社会学观点及其为解决类似问题而预先制订的综合方法，可能给历史学家以莫大益处。

此外，可以明显看出历史学家向往着历史观的立体性、多层性和综合性。社会学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系列概念，使历史学家能够提出新课题，重审传统课题，使研究客体成为多维的、“深邃的”。

课题范围的扩大和历史分析的深化在史料方面遇到严重阻碍——史料中出现空白、缺乏必需的资料等。运用隐含信息和史料外知识，运用作为获得所需资料的方法的思维实验和演绎推论，这些社会学解决史料问题的方式可予历史学家以重要帮助。

历史学家还感到需要某种程度上的研究过程定型化与一定的逻辑程序体系，这可以减少结论的主观性和印象性，提高其科学构造的理论水平与可信度。我们发现，历史学家为此采用了各式各样的分析方法。但在多数场合下，这些方法的采用缺乏严格的程序，有时使历史学家的结论失去了科学结论所要求的可信性和明确性，并且时常仅滞留于常识的水平。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概念时没有明确的定义，没有经验阐释和程序阐释，对假说、研究客体系统分析以及某种定型化的科学探索纲领存有偏见。历史学家的耳朵厌恶“定型化”一词。但在现时代，研究过程定型化是提高历史认识水

平和历史学在其他科学中的威望的最重要途径。多数科学已走上了这一道路，它们最初也象历史学一样，仅凭直觉寻索真理，浅薄地叙述自己的学术成果，如哲学（要知道希腊哲学家曾经以繁冗的对话体来阐述艰涩的真理）、社会学（最早一批社会学家如奥·孔德〈A. Comte〉和赫·斯宾塞〈H. Spencer〉的著作是用优美的文学形式写成的，曾使各国数以千计的读者爱不释手）、地理学等等。在研究过程定型化方面，社会学同样可以给予历史学以重要帮助，因为它既运用了标准程序，又采用了定型化的科学探索纲领。不是替代，而是用严格的方法与分析程序来充实对所研究事件的正确思维、想象、洞察、理解与共感——这是当代历史学家面临的任务。

此外还存在一个现代化问题，它已成为运用社会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眼前的障碍。现代化即是人们把现代世界观，把对法律、道德、理性行为、权力与威望等的现代观念，强加于过去。正象B·O·克留切夫斯基所觉察到的：“比起通过研究历史来理解现在，我们更多地是通过观察现在来研究历史。应该恰恰互反。”（着重号是我加的——B·米罗诺夫注）

从历史学与社会学合作的前后关系看，现代化问题的实质何在呢？同历史学相比，社会学极为年轻，只是形成于19世纪。随着转变为一种经验的和实验的科学，它逐渐失去了同历史学的联系，发展为主要致力于解决迫切的社会实际问题的科学。因此现代应用社会学重点是研究现代，其方法、概念体系和专门理论，几乎只是在研究现代问题的基础上，在户外和实验室的观察与实验过程中形成的，故而它很少实际运用历史学方法。当历史学家并非研究现状，而是研究遥远的往昔时，这便对历史学家运用社会学方法造成了严重限制。在历史进程中，政治设施与制度、法律与行为规范、对人的道德要求以及价值体系都在变化。对于我们

所探讨的问题大概更为重要的是，不仅人类意识的内容，而且人类意识的结构、组织以及局部的活动机制都在发生变化。因而在历史研究中机械引用社会学的方法、概念、理论与观念，可能导致简单化和社会学的庸俗化，导致错误解释动机、社会目标、价值体系及社会心理学的其他重要描述。^①

以上扼要指出了历史学家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运用社会学方法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本书将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方式。

① 如参阅И·Г·别利亚夫斯基：《对俄国1773—1775年农民战争参加者思想研究的若干总结》，载《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类，1978年，第3期，第44页。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工作	(1)
一 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研究结构	(1)
二 按照社会学纲领进行的历史研究 ——俄国农民对财产的态度	(12)
三 历史研究纲领——必要还是时髦?	(25)
第二章 新问题与新选题——新概念	(28)
一 历史学概念与社会学概念	(28)
二 俄国农民的社会流动	(37)
第三章 历史学观点与社会学观点	(45)
一 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眼中的村社	(45)
二 社会学方法的特点	(74)
第四章 寻找历史隐含信息	(77)
一 明显信息与隐含信息	(77)
二 史料应该说话: 1797—1897年俄国的识字率	(87)
三 直接信息之外	(95)
第五章 心理历史学与社会行为	(99)
一 意识的历史发展与心理上的革命	(99)
二 心理历史学与封建时代俄国农民的社会行为	(122)
结 论 新的诱惑, 抑或新的机会?	(142)
参考文献	(147)

第一章 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工作

成功时时处处取决于遵守两个条件：1. 正确判明所有活动的终极目标；2. 寻求达到终极目标的相应手段。——

——亚里士多德

一 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研究结构

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社会学家，一般都按照下列计划进行自己的研究：

1. 详细拟制研究纲领。
2. 研究该课题的史学。
3. 选择研究客体 and 考察单位。
4. 制订收集和验证资料的方法。
5. 收集资料。
6. 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史料学分析。
7. 制订整理资料的纲领。
8. 整理所收集的资料。
9. 分析已整理的资料并形成结论。

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阶段彼此相似，但在实现过程中却各具特点。对各阶段内容的分析证明，最重要的差异在第一阶段：详细拟制研究纲领。这些差异是什么呢？

社会学研究的最全面或者说最理想的纲领包括下列部分：1. 确定研究的课题、客体和对象；2. 确定研究的目的和任务；3. 阐释基本概念；4. 对研究客体的初步系统分析；5. 工作假说；6. 确定收集和分析资料的基本程序。^①

在开始制订纲领时，社会学家首先明确研究课题，即提出需要研究和解决的复杂的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随后选择答案隐于其中的研究客体（社会过程、社会现实领域等）。如若研究对象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为了直接研究，要特别注意对解决问题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特性、方面和特点。接着，社会学家要明确其研究的理论目标或实际目标，明确基本任务和附带任务。目标和任务的提出将规定某种**研究性质**——探讨性（当对客体一无所知时）、描述性（当对客体略有所知时）、解释性（当对客体颇有研究时）——和规定某一相应的科学探索方向。

在制订纲领的下一阶段，社会学家注重表现该课题重要组成的关键概念，并寻找概念同现实情况，即同那些影响到这些概念的事件、过程和现象的触合点。此即**基本概念**的阐释。确定并寻找现实的、具体的特征、意义与概念，构成概念的**经验阐释**；确定判明概念的这些经验特征的程序，则构成概念的**操作阐释**。

此后社会学家便将研究客体划分为不同成份，查清它们得以形成为一个整体的相互关系。此即研究客体的**初步系统分析**。有赖于此，被分析的客体变得更清晰和确定，被表达得没有歧义；对研究对象所掌握的知识更系统化；探索新知识的途径也更明确。

社会学家进而提出工作假说——对所研究的社会客体、现象、过程以及它们彼此间依附性质等的结构，提出理由充足的假设。假说解释所研究的现象，并据此初步回答研究的主要问题。假说是

^① B.A. 亚多夫，《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纲领与方法》，莫斯科1972年，第46～76页，
《社会学家工作手册》，莫斯科1977年，第41～123页。

分析的最重要手段：使整个研究过程依从内在逻辑而步入预定的轨道。假说还将指明，需要何种资料，为了验证而所需的资料量，怎样才有可能进行验证。因此，确定收集与分析原始资料的基本程序受所提出的假说制约。

历史学研究纲领(顺便提一下，我们注意到，历史学家工作中形成的传统并不要求这一纲领形诸文字，尽管多数历史学家实际上有自己的工作计划)时常不包括社会学家研究纲领中的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份：阐释概念体系、对研究客体的初步系统分析和工作假说。缺少这些组成部份，通常会使历史学研究失去不少东西，因为在起始概念、评价标准、所得结论的阐释等方面有过多的任意性，其结论不能通过明确的科学概念予以表达，而结果则是同其他类似工作协调不力。

并且，科学的历史学要求制订出这样一种逻辑程序体系。当任何一位专业历史学家去重复已经完成的研究并遵循相同程序时，借助这一体系应能得出同样的结论。M·A·巴尔格公正地认为这一事实：“即历史科学远非遵守这些起码的规则，并且后者遭到众多历史学家的怀疑，再好不过地证明了历史认识方式的状况。”^①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严格定形化的研究纲领的存在会损害历史分析和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本身，历史科学似乎也会同时失去本来面目。他们担忧，历史研究过程定形化将会导致定形化对其他社会科学已做过的事情：把生活的美感、精神、艺术和激情的一面萎缩到极点，用分析来替代精神和理性的价值观念。^②

当然，也有不少历史学家，即使仅是为了自己，而力求阐释

① M·A·巴尔格：《论历史研究定型化的若干前提》，载《世界史问题》，第1册，喀山1987年，第15页。

② P·佩恩托，M·略拉维茨：《社会科学方法》，莫斯科1972年，第147页。

基本概念,把研究客体的诸方面作为一个系统予以区分和联系,提出工作假说。但由于研究纲领的这些组成部份不是必要的,没有被所有历史学家看作是顺利工作的条件,因而时常是不明确、不确切和不完善地偶一为之。

假说尤其难以引入历史研究中。一些历史学家不仅逃避运用,而且甚至把假说视作某种祸根,因为它似乎将导致偏见、主观主义和将事实嵌入预先拟制的模式之中。其实,如果研究者真正寻求到真理,那么假说非但无害,而且将帮助他最起码条件来解决所提出的问题。不诚实的研究者,即使不用假说,照样可将搜集的事实驱入某一模式。恩格斯认为,正是假说的存在把思维着的研究、探讨性的研究与简单的描述区别开来。^①如果学者力图寻求新知识,那么坚守一种假说胜过一无所有,即使随着时光流逝这一假说可能被证伪。在事实基础上验证假说,这并没有给不真实的假说在科学中长期存在提供可能。因此,正确的假说是获得新知识的最重要条件。^②同时可以看到,愈有大量假说被不断引入研究过程中,其结果也就愈有巨大的科学意义。正像科学发展史所证明的,假说是研究社会与自然的强大武器。

我们现在以具体事例来分析提出和证明假说的程序。

历史学家掌握的关于俄国粮食价格的资料,描绘出在360年间,即从16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粮食价格变动的图景(1701—1710年的价格指数为100):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3~584页。

② П.Ф.拉普京:《论假说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载《历史问题》,1970年,第1期,第75~88页,Я.С.卢里耶:《论史科学中的假说与推测》,载《祖国史史科学(1976年)》,莫斯科1977年,第26~41页,В.А.亚多夫:《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纲领与方法》,第71页。

年代	1551	1591	1651	1701	1791	1845	1901
	—1560	—1600	—1660	—1710	—1800	—1854	—1910
价格指数	170	160	160	100	555	600	1940

比较俄国和西欧的价格动态证明，在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前半期，欧洲物价上涨，发生了所谓价格革命，而俄国则物价下跌。在17世纪后半期，无论是俄国还是欧洲，物价均下跌。在18世纪前半期，欧洲物价持续下跌，而俄国物价则开始急剧上涨。在18世纪后半期，俄国物价仍持续猛涨，而欧洲物价则出现缓慢上涨，在不同国家大约上涨了40~80%。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俄国和欧洲的物价出现同步变动。

上引资料证明，在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前半期西欧发生价格革命时，俄国置身其外。但在18世纪，与欧洲不同，俄国物价上涨了4~5倍，大约达到欧洲价格革命时期的程度。由此产生一个假设：俄国物价的剧涨是不是一次推迟了150年的价格革命呢？让我们回忆一下，价格革命的实质在于：货币金属贬值，货币量剧增（以足值货币充实），因而所有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出现迅猛增长，虽然比例不一。

俄国在18世纪出现了一次推迟了的价格革命，如果这一基本假说是真实的，那么便可从中推导出下列假说后果：1. 在18世纪初期，俄国主要金属货币银的价格应高于西欧数倍；2. 在18世纪的俄国市场上，贵金属应该贬值；3. 在18世纪，俄国的货币量应有巨大增长，但不应有因通货膨胀引起的严重贬值；4. 俄国的农业、手工业与工业不应出现衰退。

验证假说后果得到下述结论：在18世纪初期，俄国银价高于西欧国家9~10倍，而在19世纪初期仅高于2倍，故银贬值4/5。在18世纪，俄国投入流通的货币量（折合为银）增加了14倍，按人

均计算则增加了6.5倍。在18世纪俄国的农业、手工业与工业中未发现任何倒退的征候,相反,国家经济有所发展。这样,所有四种假说后果均被证实。由此得出结论,关于18世纪俄国出现推迟了的价格革命的假说是可信的。^①

从上引事例中,可以明显看出假说在解释性历史研究中的意义。假说实际上组织了整个研究过程。关于18世纪俄国价格革命的基本假说和由此逻辑地推导出的假说后果,使科学探索走上了预定轨道;我们开始收集的并非所有经济资料——它们不计其数,一个人即使运用现代计算技术也无力全部整理之——而仅仅是那些验证假说后果所需要的资料。假说的内容还指导着整理和分析所收集资料的程序。研究借助于工作假说而提高到分析水平,没有假说它则只停留在描述水平。仔细验证假说将保证最后结论的可靠性,排除未证实的可疑的和虚伪的假说在史学编纂中成为定论与广泛传播的可能性。

历史学家也很少对研究客体进行初步系统分析。然而系统分析对历史学家可能是极其有益的,既然它似乎能够“表现”研究对象的形态,使之表达得更鲜明、更明确和更确定。

作为事例,我们研究一下19世纪俄国农民的经济行为。**经济行为**——这是生产者经济活动的一种系统,表现出经营活动的目的及其实现方式。在具体谈到19世纪俄国农民的经济行为时,我们将其经济行为系统看作是内外动机的反映。从内在动机看,农民的经济行为可视为其经济目的与对劳动、财富和所有制的态度的现实化,其世界观、价值体系以及由其文化与智力发展水平产生的观念的表现。从外在动机看,农民的经济行为可视为村社、

① 详见B·H·米罗诺夫:《18世纪俄国的价格革命》,载《历史问题》,1971年,第11期,第46~61页。